

# 论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 政治经济学逻辑

刘方平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成熟阶段的完美呈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共同富裕建立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判断共同富裕的标准即个人拥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丰富程度,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而并非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充分发挥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公有制经济的影响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切实保障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能够公平地参与分配;围绕共同富裕这个核心目标,建立高标准、高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到生产有效、分配有效和交换有效。

[关键词]共同富裕;基本经济制度;政治经济学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1.016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美好夙愿,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中共中央对实现共同富裕作出了科学谋划,即到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sup>[1]</sup>实现共同富裕绝非朝夕之功,节奏方针不可错乱。共同富裕是一种结果而非方法,它是中国经济社会改革成功呈现出的理想状态,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成熟阶段的完美呈现。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之中,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括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步骤。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追求。从其产生的时代逻辑来看,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是针对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而提出的。在《资本论》及其他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剥削制度是导致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的总根源,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成为解决普遍贫困问题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未来社会的共同富裕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比较清晰的逻辑和观点。

### (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马克思没有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也没有明确将其纳入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本质的高度。但在他阐述未来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理想状态时,内含了对共同富裕的高度认可。在马克思看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取代了私人占有,生产方式的改变带来了生产目的和生产结果的改变。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有一部分掌握生产资料的人获益,生产结果是一部分人的富裕,是贫富差距的两极化。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未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sup>[2]</sup>“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sup>[3]</sup>共同富裕应然实现。马克思在描绘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时,多次提出未来社会是一个共同富裕、“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社会,共同富裕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共同富裕究竟是在社会主义阶段还是在共产主义阶段呈现出的特征,存在一定的理论模糊。如果超越发展阶段去实现共同富裕,或者将共同富裕当作方式而非目的,实践中则可能出现挫折。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引,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深刻认识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基础上,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提出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sup>[4]</sup>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5]</sup>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的

思想,契合了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但实质上已经包含其中的思想精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二)共同富裕建立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

在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是核心,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和如何占有是一个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在封建社会,生产资料由封建地主阶级所占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由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所占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由全体人民所共同占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只能实现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富裕,而工人阶级却为资产阶级创造财富奉献了所有,自身却日渐贫困,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颠倒的顺序。工人阶级要想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改变依附、被支配的地位,如果不能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这是无法实现的。马克思提出,“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sup>[6]</sup>恩格斯对马克思这一天才判断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马克思简明扼要地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改造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sup>[7]</sup>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或共同占有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这从理论逻辑上来看没有任何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谈及中国式现代化等问题时也多次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坚持的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sup>[8]</sup>在理论逻辑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天然等于共同富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天然等于贫富分化。但在《资本论》第一卷有关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观点的基础上,马克思又提出了一个“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问题,这里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究竟是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还是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在理论界存在分歧。<sup>[9]</sup>本文认为,超越所有制本身,“重建个人所有制”更加侧重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它已经涉及分配制度的层面。也就是说,无论“重建个人所有制”具体内涵是什么,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提高人的主观能动性,做大做好“蛋糕”是关键。

### (三)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的共同富裕

根据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理论,共同富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共同富裕,一个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共同富裕,两个阶段的共同富裕有重大关联,但又有显著区别。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刚刚脱离资本主义阶段的“土壤”,因此社会的各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阶段的特征,马克思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sup>[10]</sup>这一阶段的共同富裕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同富裕有着较大区别。首先,在社会主义阶段中,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带有旧阶段的痕迹,生产资料虽然已经实现共同占有,但分配方式依旧是按劳分配。这种分配方式遵循“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原则,<sup>[11]</sup>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根据这一原则,如果劳动者能够提供更多的劳动,那他从社会中领回的生活资料也会更多,他会变得更加富裕。如果劳动者提供的劳动较少,那他从社会中领回的生活资料也会更少,他的富裕程度显然没有提供劳动多的人高。至于不劳不得的问题,马克思没有给出较为清晰的答案。但是如果生产资料已经由全体人民所占有,即便个别劳动者不劳动或者没有能力劳动,由于他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存在,他依然能够分得部分生活资料,只是他所领回的生活资料富裕程度较其他劳动者是有区别的。总之,在这一阶段共同富裕是个相对概念,一定的差距是存在的,而且不可避免。

### (四)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中的共同富裕

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共同富裕真正得以实现。其原因有两点: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是“把‘蛋糕’做大做好”。<sup>[12]</sup>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蛋糕”已经充分做大做好,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要件。二是分配制度由按劳分配转变为按需分配。马克思认为,共产

主义高级阶段强迫劳动者服从分工的方式已经消失,分工的消失带来了“三大差别”的逐渐模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不再有明显的收入差距,劳动者获得了劳动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自由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由劳动促进了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激发了创造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实现分配方式由按劳分配转变为按需分配奠定基础。分配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是共同富裕时代的来临,在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劳动者能够提供劳动量的多少决定了劳动者富裕程度的高低,在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状态决定了劳动者的共同富裕可以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中的共同富裕是均富还是有差别的富裕?本文认为后者可能性更大,劳动者所拥有的发达生产力有高低之分,共同富裕的程度也当然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要比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要小得多。

### (五) 共同富裕的判断标准不同

共同富裕究竟有没有判断的标准?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阶段理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从《共产党宣言》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逐渐形成了共同富裕的阶段划分思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里,共同富裕的标准应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多寡。从马克思多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可以看出,马克思一直在寻找可以创造巨大生产力的新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一直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平,创造出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sup>[13]</sup>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是判断共同富裕的重要参考标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明确了这一点,提出到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sup>[14]</sup>因此,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共同富裕遵循生产力标准,其表现是人民群众拥有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多寡,两者之中前者决定后者,因此生产力是第一标准。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判断共同富裕的标准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引用查·迪尔克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sup>[15]</sup>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里,“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sup>[16]</sup>自由劳动时间越多,个人所能创造的发达生产力水平就越高,他自身也就越富裕。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两大标准有显著区别,但又有内在关联。

## 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一般原理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评价社会成员富裕的标准主要是社会成员享有的生活资料富裕程度,实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的共同富裕,首先是把“蛋糕”做大做好。如何做大做好“蛋糕”,主要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决定》中已明确指出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非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中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毫不动摇”绝非权宜之计,而是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应当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

### (一)公有制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前提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从理论逻辑上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生产为了所有

人共同富裕,而不是部分人的富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由私人所占有,这就会存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人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与之相对应的是一部分人依靠占有生产资料而富裕,另一部分人由于没有占有生产资料而出现贫困,贫富差距两极化明显,这在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中是不应该存在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存在贫富差距,一定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消除的,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富裕的差距依然会有所体现。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不同,自然禀赋差异巨大,生产要素富有程度亦所有区别,要求整齐划一共同富裕是不现实的,而且根据以往经验来看,如果只是强调“共同”,没有或忽视“富裕”在实践中的地位往往会对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产生干扰与破坏。社会主义社会允许贫富差距,只是这种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出现两极分化。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一理论逻辑认识下,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即生产资料公有制道路,公有制经济自然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前提。

因此,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自1956年实施“三大改造”以来,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命脉,在巩固新生政权、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彰显出公有制经济的顽强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在支持国家改革开放事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实现了重大转型,作出了重大牺牲,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以及党的执政根基的稳固。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是主体,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sup>[17]</sup>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公有制

经济不仅引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发达,更是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和兜底保障。如果将共同富裕比作“木桶效应”,社会中收入最低的这部分群众能否实现富裕状态,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的实现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而解决这部分人的富裕问题的难度系数会更高。根据脱贫攻坚经验,发展赋能的缺失、生产要素的闲置、自然环境的恶化等问题单靠市场方式难以解决,必须要充分发挥出公有制经济的优势来解决制约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难题,任何否定或者弱化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 (二) 非公有制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有制经济一样,两者的共生发展都能够为实现共同富裕作出贡献。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里是不可避免的。从所有制形式来说,非公有制经济属于私有制,不属于公有制范畴,看似与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相违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马克思认为,“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sup>[18]</sup>“三大改造”后,中国已经不存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原来的资本家已经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者和劳动者一样都参与到做大做强“蛋糕”的实际劳动中去,这种私有制的性质已然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制度的魅力在于,在承认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前提下,依然给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各种经济形态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是公有制成分,但在土地上建造的各种商品住房却具有私有制性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前提下可以实现共生发展,实践证明,离开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经济将丧失活力;离开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将失去支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在实

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带动了就业,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推动了技术创新与社会进步,实现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融合,为实现共同富裕发挥了积极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断,中共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中共十八大则进一步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sup>[19]</sup>这意味着不仅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中共十九大则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中。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则把“两个毫不动摇”明确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由此可以得出基本结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绝非权宜之计。即便共同富裕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但那时中国的共同富裕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做大做强“蛋糕”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而绝非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主观等同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sup>[20]</sup>“私有制经济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观点是错误的,<sup>[21]</sup>这无疑会带来市场恐慌,对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是不利的。

## (三) 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新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混合所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一样,其主要任务是做大做强“蛋糕”,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条件。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质上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新形态,与传统的公有制经济不同,混合所有

制经济涵盖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和外来资本等多种成分。这里的“混合”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混合,而不是非公有制经济内部之间的混合,如民营资本与外来资本之间的混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混合所有制经济具有公有制经济的“底色”,是一种新形态的所有制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sup>[22]</sup>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做大做强“蛋糕”的需要。在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脱贫攻坚、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都需要公有制经济发挥作用,如何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效率和活力是重大课题。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是以股份制为表现形态,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可以参股民营企业,非公有资本也可参股国有企业,这里的参股不等于直接参与企业管理,而是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调动混合所有制企业生产积极性,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市场主体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各种非公有资本参股国有企业有利于增强国有企业的生机与活力,进一步消除市场壁垒,建设更加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除极少数关键行业必须实行国有资本独资经营以外,其他行业均可放宽非公有资本参与限制。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保护国内相关产业,国家对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采取限制其他资本参与等措施。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中国逐渐放宽对非公有资本进入相关领域的限制,组建了多个中外合资企业等,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到相关行业领域。这不仅提高了国有经济的活力,而且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效益,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另一方面,各种公有制资本参股非公有制企业有利于提升公有制经济的影响力。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发挥出更大的

引领作用,其实现形态和投资对象可以多样化,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参股非公有制企业有利于发挥公有制资本的影响力,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体现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新的途径,是实现共同富裕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 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共同富裕

《决定》指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围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中国构建起了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相结合的一整套分配制度。分配制度的核心是如何把“蛋糕”分好,在做大做强“蛋糕”的前提下,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分配制度,难以保证“蛋糕”能够惠及所有人。共同富裕对分配制度提出了新要求,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sup>[23]</sup>如何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福利,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基本分配制度。

#### (一)“有效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有效市场”聚焦做大“蛋糕”的目的,实践中注重保护人的生产积极性,谁对做大“蛋糕”贡献大,谁就能够在分配中获得更多生活资料。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力的发展发达、“蛋糕”的做大做强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按劳分配是基本的分配方式,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发达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在初次分配中,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成社会主义阶段基本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阶段“蛋糕”的有限性、稀缺性有着直接的关联,具有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这种分配制度在实践中能够最大限度保护人的生产积极性,为持续做大做强“蛋糕”贡献连续不断的动力。所谓的按劳分配为主体,指的就是在

市场经济中多劳多得、少劳少得,鼓励一部分人通过个人努力先富裕起来,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路。这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与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相契合。“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按劳分配制度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在有效市场下必然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靠着勤劳和智慧先富裕起来,从而带动其他地区 and 人民走向富裕之路。在共同富裕的要求下,按劳分配制度应当更加注重提升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谁多劳谁就多得,切实提升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和福利水平,真正让劳动者在分配制度中感受到公平与正义。这符合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判断,“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sup>[24]</sup>

除了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外,还有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决定》指出,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都可以参与到分配中来,只要这些生产要素对生产力发展带来贡献,就应当在分配制度中有所体现。实现共同富裕,“不劳不得”应当有所调整,在有效市场中,各种生产要素对做大做好“蛋糕”的贡献越来越大,劳动者即便不直接参与劳动,但其拥有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起到推动作用,也可以获得相应收益。让劳动者拥有的生产要素充分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在有效市场中致富。以资本这种生产要素为例,没有资本的聚集就没有现代工业的发展,没有资本要素的注入就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商场、通信等,资本作为一种生产性要素,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伟大创造,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sup>[25]</sup>必须“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sup>[26]</sup>但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具有盲目性、逐利性、扩张性、斗争性等特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是有所体现。根据价值规律,资本倾向流入利润率高的行业,中国经济中出现的“炒房”“炒地”等现象背后都有资

本的身影。因此,在有效市场下应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防止无序扩张,为资本的健康发展设置“红绿灯”,进一步规范资本有序发展,合理引导资本流入技术构成高、创新性强的领域,助力中国经济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总之,需要发挥生产要素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并在分配制度中给予体现。

## (二)“有为政府”主导的再分配与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sup>[27]</sup>政府有为不是否定市场有效,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必然要发挥出有为政府主导的再分配的关键性作用,这是因为单靠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解决不了“土地的贫瘠、环境的恶劣、基础设施的落后、教育资源的匮乏”。<sup>[28]</sup>共同富裕是所有人的富裕,不是一部分人富裕,另一部分人不富裕,而劳动力的先天差距决定了在有效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从市场中拿回的消费资料多些,而另一部分人拿回的消费资料少些。马克思认为,“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sup>[29]</sup>马克思这里提出的平等观明显是偏向公平层面,如果使用同一尺度去衡量劳动者从社会中领回消费资料的多少,这看似平等实则不公平。得益于先天禀赋和后天优势的差异,有些人注定生活资料较为丰富,而另一部分人则难以“逆天改命”,终生贫困潦倒。长此以往,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两极化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造成社会动荡、政权更迭、财富蒸发,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惨重。因此,在效率与公平这对关系中应当统筹兼顾,如果说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的话,再分配应当更加注重公平。解决最后一部分人口共同富裕问题,需要发挥政府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式实现对“蛋糕”的再分配,支持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保持动态平衡,对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现象进行合理调节,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

义,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力量来源,党的领导优势成功转化为政府治理效能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的内在密码。世界上一些国家建构失败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速,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直都拥有一个合法高效的有为政府,有为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对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都不能少。有为政府发挥对“蛋糕”的再分配作用,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向落后地区的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夯实共同富裕的客观物质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贫困地区扶贫开发计划,以及“精准扶贫”“中部崛起”“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推动了东中西部均衡发展。国家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各项发展战略,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充分彰显出党和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再分配的政府调节能力。

### (三)“有爱社会”主导的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sup>[30]</sup>和谐的社会表现为有爱的社会、有序的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有爱,是人与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有序。仅从物质层面来讲,分享“蛋糕”是有爱社会的生动体现,也是社会物质财富丰富的重要表现,在生产欠发达,人民群众拥有消费资料有限的前提下,难以奉献出多余的“蛋糕”给其他人。在生产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后,以奉献“蛋糕”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制度开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成为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后的补充分配制度。第三次分配制度围绕道德或社会责任心为核心设计,通过分享“蛋糕”的涓滴效应进一步降低

基尼系数,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传统认知不同,第三次分配难以对效率与公平产生根本性影响。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第三次分配的表象性意义要大于其实质性意义,它支持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入健康轨道,对于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鼓励勤劳致富、合法致富、先富帮后富,消除社会仇富心理,营造和谐有爱的社会文明氛围,构建共同富裕社会将更有意义。

第三次分配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学术视野。1991年,厉以宁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提出影响收入分配的力量有三种:市场、政府和道德。<sup>[31]</sup>随后,他在《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几个问题》《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等论著中详细阐述了第三次分配理论。从第三次分配概念引入中国的外部环境来看,20世纪90年代正值西方国家大肆宣传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巅峰时期。但事后发展情况表明,第三次分配并没有西方国家宣传的那么美好,发达国家的实践说明了这一点。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慈善事业全球领先。根据 *Giving USA 2021 Report: Charitable Giving Trends*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慈善捐款高达4489.9亿美元,<sup>[32]</sup>但其基尼系数经过三次分配调节后仍然高达41.5%,<sup>[33]</sup>比2018年还增长了0.1个百分点。这说明高额的慈善捐款对降低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起到明显效果。第三次分配制度在欧美国家的实践表明,它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可高估,“完全依赖慈善事业体系无法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sup>[34]</sup>这并不否定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只是说相对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而言,第三次分配起补充作用,不能将实现共同富裕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第三次分配上,这样做不仅无法实现共同富裕,还会引起一定的市场恐慌心理,对做大做强“蛋糕”将带来不利影响。

总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三次分配制度之间并不是孤立的、毫无联系的,而是应当相互协调配合、综合发力,分别发挥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在三次分配制度之间的主导作用,注重保护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培养正确财富观。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理论结合实践的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立提供理论依据,它不再将世界市场人为分裂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从而停止了市场经济姓“资”与姓“社”的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一) 市场经济为人民富裕提供内生动力

由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领衔发布的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研究报告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跻身为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其共同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们是市场经济的国家或正在转向市场经济。<sup>[35]</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即市场经济似乎可以天然地带来富裕。富裕本无罪,富裕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现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致富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具有政治和道德意义。要消灭贫穷,实现富裕,只能走市场经济这一条康庄大道。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与之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即市场自主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多少?价格多少?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sup>[36]</sup>劳动者的生存需要、发展

需要和享受需要推动着劳动者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从市场中获得更多消费资料。市场通过利益分配机制和竞争机制赋予市场主体源源不断的致富动力。由于劳动力与简单生产工具结合不及劳动力与复杂生产工具结合下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高,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必然会带动更多的劳动者与更加先进复杂的生产工具相结合,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商品价值,从而获得更多利润,实现致富。

市场规模的扩大,更加精细的分工,都在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加速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使国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sup>[37]</sup>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判断并不是否定计划经济在未来的发展空间,而是聚焦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态和阶段,可发现市场经济是做大“蛋糕”最有效的方式。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使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实现自由流动和最优组合,使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源泉得以充分涌流,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拥有发达生产力)和社会的进步,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中关于富裕的理论判断。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sup>[38]</sup>这一改革方向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建设高水平有效市场的关键。这意味着市场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各类市场主体为了满足致富的内生动力,在市场竞争机制中必然要寻求各类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这在无形之中带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市场主体致富能力的提升。

(二) 社会主义为市场经济朝着共同富裕发展提供方向指引

市场经济可以带来富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

能否带来共同富裕,学术界对此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通过市场经济可以自然地实现共同富裕,如张维迎认为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收入差距就越小。<sup>[39]</sup>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并非万能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是市场竞争带来的直接结果,市场经济的自发机制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有效市场主导的分配机制有利于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的一方,使资源、财富等自发地流向少数的强势群体,无法实现分配正义。<sup>[40]</sup>从实践中来看,市场经济在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中也有缺陷存在。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确实解决了这些国家的富裕问题,但这种富裕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富裕。以欧盟国家为例,2022年7月,欧盟国家内部最低月工资标准在363欧元(保加利亚)到2313欧元之间(卢森堡)。<sup>[41]</sup>仅在最低工资标准问题上,欧盟国家内部就呈现出最低工资收入差距两极化的现象,如果纳入社会其他群体工资水平参数,这个差距会更大。但不能据此就得出欧盟国家市场经济带来了贫富差距两极化的结论,这是因为即便以保加利亚最低月工资标准363欧元为参数,也高于现阶段中国最低月工资标准中较高的北京地区水平(2320元人民币)。<sup>[42]</sup>因此,那种认为西方国家现代化使一部分人富裕,另一部分人贫穷的观点值得商榷,只能说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收入差距的两极化这一论点。

中国对共同富裕的定义有两点要求:一是所有人的富裕;二是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富裕,不是整齐划一,不是两极分化。1992年邓小平在阐述社会主义本质论时就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43]</sup>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实践经验来看,市场经济不能自然实现中国式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不但不能丢掉,而且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点睛之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

的前提下,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进所有人的富裕。这有助于克服市场经济的分配缺陷。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扬弃”和更高级别的发展,具备了优良特点和制度优势,它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使市场经济始终保持在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防止收入差距两极化。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不能丢,否则就会陷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旧逻辑之中。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路径遵循

1978年以来,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大目标,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4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4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无到有,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从“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转变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平均分配转变为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国家计划调节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缺乏市场竞争转变为各类市场主体共同参与到统一、开放、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等等。不可否认,中国已经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中国人民逐步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步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时代。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而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有效市场的核心内涵,是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不强、受外来因素影响较大、法治不健全、市场主体竞争力不强、要素市场建设亟需完善等问题,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构建“有效市场”为核心。有效市场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由尤金·法玛(Eugene F. Fama)在其著作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 中提出,其核心思想是市场价格能够准确反映各类真实的市场信息。在真实市场中,价格能否准确反映各类市场信息受多种因素影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有效市场可以有生产有效、分配有效、交换有效等几种形态。围绕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市场如何做到生产有效、分配有效和交换有效?这应当建立起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生产有效需要振兴实体经济,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发展和振兴实体经济,淘汰落后和无效产能,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有效供给,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确保生产有效。其次,分配有效需要建立健全市场法治环境,推进要素市场建设,让各类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都可以参与到市场分工之中,公平地参与分配。再次,交换有效以价格有效为基础,价格是价值多少的真实反映,理论上两者之间应是等同关系,但由于市场信息的不透明、供给状况波动的影响,商品会出现以高于其价值或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的情况,前者出现生产者剩余,后者出现消费者剩余。从理论上来说都不能称之为价格有效。因此,我们需要建立起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反对各种行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加强各类知识产权保护,确保交换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有效反过来也有利于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金融风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对于进一步做大、做好、分好“蛋糕”意义重大。

## 五、结 论

第一,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前提要件。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共同富裕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前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丰富程度,后者是自由劳动时间的多少,即个人拥有发达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能用高级阶段共同富裕标准来要求第一阶段共同富裕。

第三,实现共同富裕还得依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基本经济制度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绝非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而言之,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我们需要进一步做大做强“蛋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建立起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地实现共同富裕。

###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9页。

[4][8][4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142、3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页。

[9]参见王成稼:《论“重建个人所有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兼评谢韬、辛子陵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试解》,《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周宇、程思富:《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卫兴华:《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解读、评论与争鸣的一些看法——兼谈王成稼研究员对“重建个人所有制”不同解读的批评和有关观点》,《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10][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4、363页。

[1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共产党员网，<https://www.12371.cn/2021/12/10/ART11639136209677195.shtml>。

[13]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1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4、787页。

[17]《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 开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2日。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2页。

[19][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58-259、259页。

[21]卫兴华：《新中国60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巩固》，《红旗文稿》2009年第17期。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8页。

[2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4][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435页。

[2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1日。

[26]《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2-04/30/content\\_5688268.htm](http://www.gov.cn/xinwen/2022-04/30/content_5688268.htm)。

[27]《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2/12/27/c40531-32594255.html>。

[28]刘方平：《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国家贫困治理的政治经济学解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30]《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5页。

[31]厉以宁：《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

[32]The Giving Institute, *Giving USA 2021 Report: Charitable Giving Trends*, <https://www.qgiv.com/blog/giving-usa-2021/>。

[33]The World Bank, *Gini Index*,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INI?view=map&year=2019>。

[34]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人民论坛》2021年第28期。

[35]林毅夫：《创新与比较优势结合才能推动可持续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药方”》，《北京日报》2020年1月6日。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4页。

[37][英]亚当·斯密：《国富论》，胡长明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4页。

[3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39]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40]朱富强：《市场的逻辑还是逻辑化的市场？——流行市场观的逻辑缺陷》，《财经研究》2014年第5期。

[41]Eurostat Statistics Explained, *Minimum wage statistics, Data extracted in July 2022, Planned article update: 31 January 2023*,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Minimum\\_wage\\_statistics](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Minimum_wage_statistics)。

[42]根据2022年7月份汇率计算，1欧元=6.8739元人民币，保加利亚最低月工资标准363欧元约等于2495.23元人民币。北京地区的数据参见：《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截至2022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laodongguanxi\\_/fw-yd/202204/t0220408\\_442833.html](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laodongguanxi_/fw-yd/202204/t0220408_442833.html)。

[责任编辑：刘毅]